

中 国 文 学

(魏晉南北朝 唐五代部分)

吉林師範大學函授教育處出版

西南師範學院翻印

1961. 11.

目 錄

魏晉南北朝部分

第一章 魏晉南北朝的社会概况与文学.....	(1)
第二章 魏代文学.....	(11)
第一节 “建安七子”与蔡琰.....	(11)
第二节 曹操.....	(15)
第三节 曹植.....	(17)
第三章 晋代文学.....	(20)
第一节 嵇康与阮籍.....	(20)
第二节 左思.....	(24)
第四章 陶潛.....	(26)
第一节 陶潛的生活道路与创作思想的发展.....	(26)
第二节 陶潛詩文的特殊成就.....	(29)
第三节 陶潛写作的局限性.....	(36)
第五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38)
第一节 南朝乐府民歌.....	(38)
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	(42)
第三节 木兰词.....	(45)
第四节 有关南北朝乐府民歌的问题.....	(49)
第六章 南北朝文学作家与批评家.....	(51)
第一节 鮑照.....	(51)
第二节 酈道元、陽銜奎、庾信.....	(56)

第三	刘勰与《文心雕龙》	(60)
第四	鍾嶸与《詩品》	(66)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小說故事	(68)
第一节	志怪故事	(69)
第二节	佚史故事	(74)
結 語		(76)

唐五代部分

緒 論		(79)
第一章	李 白	(81)
第一节	李白的生活道路	(84)
第二节	李白的詩篇	(87)
第三节	李白創作的意义	(93)
第二章	岑 参、高 适	(96)
第一节	唐初的战争与詩人創作	(96)
第二节	岑 参	(98)
第三节	高 适	(102)
第三章	杜 甫	(103)
第一节	杜甫的生活与創作	(104)
第二节	詩歌的分析	(108)
第三节	杜甫創作的成就及其意义	(123)
第四章	張笈、王建	(125)
第一节	張 笈	(125)
第二节	王建等詩人	(129)
第五章	白 居 易	(130)

第一节	白居易的创作道路	(130)
第二节	白居易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见解	(135)
第三节	白居易在文学中的地位	(142)
第六章	皮日休、杜荀鹤及唐末的诗歌	(145)
第一节	皮日休	(145)
第二节	杜荀鹤	(149)
第三节	唐末期的诗歌	(151)
第七章	韩愈 柳宗元	(153)
第一节	韩 愈	(153)
第二节	柳宗元	(157)
第八章	唐代传奇小说	(160)
第一节	唐传奇的产生和发展	(160)
第二节	传奇小说的思想性艺术性	(161)
第三节	传奇小说的成就及对后代的影响	(165)
第九章	唐代民间文学	(167)
第一节	民间文学资料的发现与整理	(167)
第二节	民歌	(168)
第三节	民间叙事诗与“韩朋赋”	(171)
第十章	唐五代曲子词	(177)
第一节	曲子词是城市居民的抒情诗样式	(177)
第二节	民间的曲子词	(178)
第三节	李煜与五代词	(180)

魏晉南北朝部分

第一章 魏南北朝的社会概况与文学

暴发在中平元年（公元184）的黃巾大起义，曾席卷中原一带。这次农民运动动摇了后汉帝国的封建统治，打击了地主豪强的兼并和剥削。黃巾起义失敗以后，地主阶级的互相攻伐造成了封建割据局面。从后汉建安元年算起，到陳朝禎明三年为止（公元196—589），这个封建割据局面，几乎延續到四百年（其間仅西晉有十多年的統一）。这一历史时代处于極其混乱、黑暗、反动的阶级。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和地主内部矛盾呈現着长期性的复杂尖銳状态。

建安前后地主渠魁的混战杀伐，使“墟邑无复行人”“名都空而不居”“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鳴”。这些軍閥黷武嗜杀，勾結胡羌，“杀民社下，載妇女財物”。战争造成了經濟的衰落，城乡的殘破，各地人民流散，“道殣相望”，千里无人，从而整个社会陷入倒退的境地。建安初年，曹操集团为了充实軍力削平羣雄，在接受黃巾起义的教訓中，曾經減租稅，抑兼并，并及时地实行屯田制。結果，初步恢复了黄河流域的殘破經濟，把社会秩序安定下来，曹操的革新精神在当时起到了各方面的进步作用。

西晉憑曹魏实力，于公元280年統一全国。西晉依靠門閥大地主取得了政权，也是門閥大地主的代表人。許多措施如占田廩客及九品中正制等都是反动的。在地主阶级日趋沒落内部

矛盾日益尖銳中，西晉以分封藩王維持帝國統治的企圖，隨着“八王之亂”而宣告失敗。這次戰亂並導致了西北各族的入侵和西晉的滅亡，東晉建立以後，形成了長期的南北對峙的局面。

北朝第一個朝代是拓跋魏，它結束了歷史上所謂“五胡十六國”的各族大混戰時代。“五胡十六國”的前一階段是北方各族侵凌漢族的時期，“異類羣飛，奸兇角逐”，使黃河流域陷入千里蕭條的境地。“五胡十六國”的後一階段，是北方各族展開生死存亡鬥爭的時期。一個部族戰勝了，它可以繁榮強盛，保持了乡土與生活；如果失敗，就遭受蹂躪淪為奴隸。因而在“更相吞噬，迭為驅除”的情況下，黃河流域遭到又一次破壞。人民流離死亡，有的縣邑不滿百戶，有的已經是“靡有孑遺”。各族統治者的殘酷統治，曾引起人民的不斷反抗，從而產生了一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與戰鬥事跡，例如陳安、冉閔等是。

北魏統一的初期，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仍然是尖銳的，人民的反抗運動相繼興起。等到魏孝文帝實行均田制，使廣大人民重新獲得土地，一定程度的恢復了生產，安定了社會秩序。同時，北魏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提高本族文化，曾有意識地接受漢化，下令學漢語，易華服。於是兩族人民漸次融合，北中國的文化得到了新的發展。當然，反動的九品中正制也從此施於北方。北魏分裂為北齊、北周，北齊又為北周所吞併。東西戰爭雖然不斷，種族壓迫雖然未能完全消除，但北周時期經濟文化的發展終於為隋朝的統一打下了基礎。

南中國自晉以後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這便是歷史上所謂南朝。南朝因襲着兩晉的政治經濟，存留着東晉以來的各種社會矛盾。但南朝也有與東晉不同的特點。一方面，對門閥士族採取分化與駕御的策略，消滅東晉以來的“政出多門”的現象，一方面分封宗室以巩固皇室的封建統治，企圖加

强中央集权。門閥士族本来日趋沒落的，这时逐渐由政治的支配者淪为貴族的郡閥。而統治者的內部火併也異常凶險，宋、齐、梁、陳先后十八帝，其中十二帝死于非命。宋明帝、齐明帝的殘杀宗室都是連根誅除。真是“帝昏狂暴，接踵繼出”，統治者的腐朽殘酷是史无前例的。陳朝建立，南朝的封建統治更为沒落。陳后主“君臣酣宴，从夕达旦”，从而在历史上被目为荒淫腐污的典型昏君。

这时期主要的矛盾仍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且在整个魏晉南北朝期間是尖銳的。

三国时代，地主阶级实行屯田，固然恢复、发展了社会經濟，有益于人民。但統治者之間的掠夺人口，强迫屯田，以及田賦的剝削，还是同人民存在极大的矛盾。西晉初，門閥地主不同程度地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佃客。門閥官僚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蒼头八百余人”，“后房百数”，田宅与相称。王戎“广牧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王导在鍾山有田八十余万頃。謝安在会稽有田产数十处，湖泊四个。刁逵有田万頃，奴婢千人。宋刘道怜有水田万余亩。齐蕭子良領山澤数百里。梁蕭宏放高利貸夺取农民土地，有廩房百間，錢三亿万，都下有数千邸。结果是“富强的者兼嶺而占，貧弱者樵苏无托”地主阶级在集中土地財富的同时，奢侈荒淫达于極点。他們“日食万錢，犹曰无下箸处”（何曾）；他們“竞賽珍玩服飾酒食，甚至杀戮婢女求下酒”（王愷、石崇）；他們鳩集士众，游山逛水，曲宴高会（石崇、王羲之、謝灵运）。貴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顏氏家訓）。地主阶级这种豪华荒淫的寄生生活是建筑在剝削人民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侯景化所說：“今日国家池園，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通鑑）西晉屯田足以償种”。因而地主阶级的奢侈豪华与人民的貧困飢寒形成了对立状态。西晉初年，东南地区“秋夏蔬食之

际，而“百姓已有不瞻，前至冬春，野无青草。”（晋书）咸宁期間，仍然是“百姓不瞻”，一岁不登，民有菜色。”（晋书）晋宋以后，“权門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賦役严苦，貧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殘形剪发，以要复除。”（宋书）“亦有折断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恆事。”（南齐书）这种对立情况一直延續到陳朝末年。

在北方，階級矛盾由于含有种族矛盾而更加尖銳化。以北魏末期为例，統治者是豪奢荒淫的，人民則是極其貧困痛苦的。統治者有的“奴婢千人，田业盐鉄之利偏于远近”（魏书），有的“僮仆六千”，驕奢淫佚。他們“爭修园宅，互相竞夸”，腐敗情况不下于南朝。而僧侶地主也“侵占細民，广占田宅”。在統治者殘酷的剝削压迫下，乡村凋敝，“田多荒亩”，“閭里空虛，民多流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的。

階級矛盾如此尖銳，人民羣众自然不断地起来反抗。如西晋时期以李特、張昌、杜弢为首的流民运动，东晋末以孙恩为首的“乐屬”人民的大暴动，梁天监年間，农民起义在十次以上，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前，人民的暴动起义不下八十余次。但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間，封建割据將近四百年，統治階級都分別地豢养着足夠的軍隊来进行兼并鎮压人民，統治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这种割据局面和地主武裝使农民的反抗不容易形成大规模的起义战争，剛好相反，这时候的农民运动在具体社会条件制約下却处于低潮阶段，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社会混乱黑暗、停滯不前的重要因素之一。

地主階級統治的殘酷，和人民羣众公开的階級斗争的比較弱小，也决定于当时的門閥制度与統治思想。后东的察举品題制度，已經使門閥士族获得成長。他們壟断乡选举里和人物品評，同他們有关的人才能得到察举，做到官吏的人就永久是“門生故吏”。門生故吏”就得为主人作政治斗争甚至卖性

命，世家大族从而把持政治，有的做到“四世三公”。地主阶级割据性与殘暴性充分暴露出来。曹魏初年，曾經打击豪强，向农民让步，对士族門閥采取了統治的政策。魏文帝实行九品中正法，在选举方面向士族門閥妥协。开始时只是憑九品法“論人才优劣，非謂士族高卑”。西晋則代表了門閥士族的利益。除了执行九品制以外，又頒布了依品佔田制，在政治經濟制度上使門閥士族的特权合法化。門閥士族壟斷了政治的經濟的特权实际成为政治的支配者。从而形成了“上品无寒門，下品无世針”“世胥躡高位，英俊沈下僚”的状况。“权归大姓，晋宋因之”，南北朝也相承不变。門閥士族从九品中正制中得了佔有土地的經濟地位，巩固了世襲的政治地位，这种特殊地位和养尊处优，就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腐朽与无耻。

地主門閥不仅在政治經濟上处于支配地位，也壟斷了当时的学术思想，即巩固发展了玄学思潮。后汉末，强豪世族在集中土地、壟斷选举、取得特权儼若封君的情况下，其割据性、奢侈性日益滋長，老庄思想遂成为他們清談的主题。虛伪的儒家教义和繁瑣礼法随之退居次要地位。这种玄学在魏晋以后，正好与九品制互相表里，成为士族地主的統治工具：无为、自然維護了他們既得的政治經濟特权，也美化了他們无能的腐朽的寄生生活。玄学思想对于被統治的人民又产生严重的麻醉作用。

从两晋盛行的道教、佛教，作为維護封建統治的宗教迷信，在当时更有麻醉作用。道教徒欺騙人民肉身成圣，佛教徒欺騙人民西天成佛。这种麻醉人的宗教迷信，“宣傳对神的信仰。对来世的信仰，向劳动者灌輸人世生活轉瞬即逝和爭取摆脱阶级压迫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思想，規劝他們对人世上的非正义的社会現象采取消極忍受的态度，答应他們死后可以升入天堂。”（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5頁）自然是对地主統治者服务，而使人民在斗争上解除武装。当时道家的符录丹砂說和佛教的

“形尽神不灭”論，是佛道迷信的代表性的謬論。

正是由于殘酷的封建割据統治，由于地主階級統治性的玄學思想和佛道迷信，人民公开的階級鬥爭才趨于衰弱，農民運動处于低潮狀態。

當然，在当时意識形態領域中也存在着人民的先進思想。進步思想與反動思想的不斷鬥爭，清楚地反映了時代的階級矛盾。

在魏晉之間，当地主階級玄學籠罩一切的時候，嵇康、阮籍以統治者所壟斷的玄學觀點，從另一角度否定了封建禮教和封建秩序，揭露了当时封建統治者的黑暗與腐朽。其次，来自黃巾起義的民主思潮，在尖銳的階級矛盾情況中也有所發展，主要表現在鮑敬言前的“無君無臣論”。鮑敬言的專論，主觀上是要求統治者“卑宮薄賦，使民以時”，但是全部論文却从農民角度勾划出無剝削、無壓迫、無掠奪的幸福美好烏托邦。鮑敬言說：“曩古之世，無君無臣，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勢力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民获壽終，机心不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安得聚斂以奪民時，安得严刑以为玩弄！”他又說：“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飢。”很明显，作者是站在人民角度反对当时的封建統治，因而以他所能想象的原始公社生活，对比当时的租稅徭役与战乱，并提出無君無臣、人人劳动的理想社會。这种烏托邦的产生，正如列寧所說：“一个國家自由愈少，公开的階級鬥爭愈弱，羣眾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烏托邦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久。”（論两种烏托邦、列寧文选18卷，347頁）。

至于盛極一时的佛教、道教，尤其是佛教，也不斷受到進步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抨击，在东晉末，陶潛写了《形影神》詩，用文学形式对佛道迷信提出否定的意見，第一次抨击

了佛教徒的“形尽神不灭”論。由宋到梁，何承天和范縝等以他們的“神灭論”对佛教做了更为彻底的批駁。这一些論战表明当时两种思想的搏斗，搏斗显示出反动思想的强大，也显示在搏斗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

魏晉南北朝的进步文学与地主貴族文学，就是在上述现实的土壤中生长着的，彼此之間同样存在着深刻矛盾。

代表建安文学的乐府詩歌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时，中原殘破不堪，人民流离失所。飽經战乱的文人謀士与詩人，他們继承了民間詩歌傳統，以新的艺术形式（包括体裁和語言）描述社会生活，抒发个人思感。因而把人民的苦难，把封建暴政的罪恶，把个人对乱世的不满与悲憤、对开明政治的渴望与歌頌，作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艺术反映。内容是现实的，样式、語言是朴素的，风格、情調是激揚的、熱烈的。所謂“建安風骨”大体就是如此。建安文学不但继承和发展了民間乐府詩的傳統，而且冲破了后汉末貴族辞賦模拟抄襲的惡濫文风。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起到承先啓后的典范作用。曹操、蔡琰、“建安七子”的詩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成果。

魏晉以后，地主貴族文学占統治地位，这是和士族門閥制度的固定分不开的。西晉平吳，把南北貴族文人集中在洛陽。当时張华、張协、潘岳、陸机、何劭、成公綏等都分別以辞賦詩歌来歌頌功德，敘述游宴、歌唱游仙。即使五言詩也同样陷入形式主义泥沼。尤其是那些神祕气氛的游仙詩。地主文人利用古代神話傳說制造出美麗的虛无世界，以寄托其沒落苦悶的灵魂，正是他們留恋富貴、惧怕无常、渴望长生等沒落思想的反映。兩晉之际，并出現了以孙綽、許洵为代表的玄理詩。这种詩以老庄詞句表达其階級偏見和虛无感情，实际是借此显示身分派头，粉飾寄生生活，安慰內心寂寞而已。即使对玄学來說，也很少补充或說明。晉宋之际，士族門閥更是沒落和頹廢了，玄理詩遂以山水詩的題材出現于世。山水詩是貴族宴游詩的

發展，是玄理詩的變種。它開始于石崇等的“金谷事”，賡續于王羲之的“蘭亭集”，而泛濫于謝靈運的寫作。門閥士族“占山封水”，獲得了物質享受，他們也就用名山勝水追求精神上的逸樂。山水詩是士族門閥山水產業的自我陶醉，是奢侈生活的具體表現。

他們的山水詩夾雜着濃厚的頹廢情調和玄學思想。而且象謝靈運的詩歌，在排比對仗、堆砌詞藻方面又與顏延年一樣，都是模擬了陸機的貴族詩歌形式并變本加厲。可以說南朝唯美的形式主義文風，由他們沖開了一條逆流。謝靈運還利用文字音韻制造了一種“闌緩”格調。南齊初年，當《四聲譜》一類著作形成之際，沈約、謝朓諸貴族文人就把“聲病”說法運用到創作上，使詩歌形式加一層局限。這同謝靈運的寫作也大有聯繫。

在這種形式主義的籠罩下，蕭梁初年又出現了宣淫色情的宮體詩。這種詩題不出姬妾優伶，表現不外美貌色欲，以淫蕩的詞句作色情的描繪，是腐朽的剝削階級對女性的戲弄侮辱。這種淫靡詩的寫作，從蕭綱、徐陵、庾信等開始一直到陳叔寶君臣為止，盛行了幾十年。更加表現了地主貴族的荒淫與無恥。

所有上述這些反動文學是地主階級沒落期間的產物。是我們應該注意剔除的封建糟粕。應該指出，這些作品的思想內容是落后的反動的，但它們還有某種藝術性，譬如謝靈運的山水詩有一定的表現技巧。毛主席教導我們說：“處於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艺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從這時期的地主文學情況說明毛主席上述原則的正確性。我們時常要記住毛主席這一英明指示。

地主階級文學的形式主義文風，自然也表現在散文方面，陸機的《辨亡論》對仗已經嚴格。宋齊以後，四六駢文逐漸形

成。就連《文心雕龍》等理論著作也使用了這種體裁。

地主階級的散文，其思想內容是反動的。佛教、道教流行以後，宣揚宗教迷信的鬼神志怪也盛興一時。有的強調導引吐納為道士張目，如傳為曹丕作的《異聞記》及劉敬叔的《異苑》。有的盛倡因果宣揚佛法，如苑義慶的《幽明錄》，顏之推的《冤鬼志》。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宣揚了迷信，麻痹着人民的反抗意志。是徹頭尾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反動東西。

南朝的形式主義文風也影響了北朝。北魏從“孝文改制”以後，統治者開始吸收南朝的典章制度以鞏固其封建統治。南北朝的聘問接觸也是這時候加多的。因此，北朝接受了南朝的文風。被稱為“北地三才”的溫子昇（北魏）、邢邵（北齊）、與魏收（北齊），幾乎都在模擬沈約與任昉。至於北周；被拘留的南朝王褒和庾信，都是長期居住長安，南朝文風通過他們更是泛濫於關西一帶。以正統自居的北周貴族，當然也有意識地以先秦文學來矯正齊梁的卑靡文風。蘇綽模倣《周詔》作詔令，表現了西河文化代表者對南朝文學的抵抗。這種行為也是後代古文運動的先聲。可見以形式主義代替形式主義的地主文學內部也在發生鬥爭。

但是，進步的文學，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制約下仍然沿着曲折道路向前發展，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就。魏末晉初，在士族門閥殘酷統治下，“名教”與“玄學”思想控制了當時文化。但稽康、阮籍等，一方面以行動對統治者消極對抗，一方面寫了許多詩文，借玄學中的自然教義直接或曲折地抨擊封建統治。這些作品，即使是悲觀、感傷、蒼白無力，但仍然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殘暴、腐朽和荒淫，基本上畫出了時代的陰暗面。在晉初，士族門閥壟斷了政治經濟形成了世襲貴族。他們最有勢力，他們也最為無能。左思的詠史詩就是從這些方面戳穿他們的丑惡咀臉。自然、稽康、阮籍、左思等還不是站在人民方面，而是從個人角度來抨擊封建統治者的。因此，他們的寫作有

一定的局限性。东晋期間，封建剝削更殘酷，公开的階級矛盾处于低潮状态，农民的烏托邦思想长期存在，封建政治也日趨崩潰，統治者的內閥連年不断。正是这样的历史时代决定了詩人陶潛的生活道路与創作道路，使他写出歌頌农耕劳动的詩篇，写出《桃花源記》等进步的作品以及反佛反道的組詩。他的詩是如此通俗朴素，把五言詩推进了一大步。

在宋初，出現了进步詩人鮑照。他同顏、謝表現了相反的傾向。所有他的重要詩篇，从各方面抒发了反封建、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这些詩有的使用了当时的民間詩歌形式，語言是优美的，韻律是誘人的。即使某些雕章琢句的作品，同当时講对仗、講詞藻的作品，也因为其进步內容而显示了区别。

伴随文学的發展，文学作品的大量积存，文学觀念的逐漸清晰，文学理論也得到了空前进展。在曹丕《論文》、摯虞《流別》、陆机《文賦》等的傳統理論作用影响之下，产生了刘勰的專門著作《文心雕龙》。伴随詩歌写作的繁盛，反形式主义的斗争的起来，也产生了專門的詩歌評論，即鍾嶸的《詩品》。在反对南朝卑靡的文風方面，這兩部書具有較大的社会意义。而在北朝，如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阳伽藍記》，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也是具有时代特点和社会意义的几部文学性的著作。

这时期的民間文学有了进一步的發展，取得的成就是不小的。这表现在南北朝民歌和魏晉以后的民間故事上。南朝商业城市进一步繁荣，作为当时民間詩歌的一部分，如吳声西曲等，得在城市中流行和發展。吳声西曲有許多作品是充滿人民性的，反映了人民自己的生活感情与愿望要求。在北朝，絕大部分是鮮卑民族的歌謠。当胡汉民族漸次融合之際，这些歌謠经过翻譯得到应用和流傳。这些歌謠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与习俗，当时的社会离乱与尚武精神。在这些歌謠的艺术傳統

孕育下，还产生了偉大的敘事詩《木兰詞》。南方和北方的上述民間詩歌是不同文化傳統生活習慣的文学作品，它們共同丰富了这时期的詩歌內容。

所有上述这些方面，說明魏晉南北朝的进步文学还是很丰富的。它們同当时的地主貴族文学形成了尖銳的对立状态。在貴族文学思想的統治下，这些进步文学沿着较为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它的成就显示了历史时代的特征。

第二章 魏代文学（196—240）

第一节 “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七子”是王粲、陳琳、徐干、刘楨、阮瑀、应璩和孔融。除孔融早死外，他們为曹操萃集在鄴下，同“三曹”繁欽等所写的作品，被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七子”经历了長期战乱。他們关心国事，比較了解人民疾苦，从而继承了民歌傳統，写了些反映社会动乱与人民生活斗争的詩篇。

王粲的詩，以《七哀》为代表。

《七哀》詩之一，是以李傕、郭汜等軍閥混战、作者逃往荆州为背景写成的。初平二年（191），李、郭等与胡軫、徐荣混战于新丰，又攻破長安，吏民死万余人；兴平元年（194），李、郭等与馬騰、韓遂战于長平观（長安南五十里），“斬首万余級”。当时，長安城中，死者狼筴，李、郭等“放兵劫略，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尽”。十八岁的王粲，曾目击这种混乱悲惨情况，在他从長安赴荆州的道路中，根据亲身感受了这首詩。

作者詛咒軍閥战争使西京陷入“乱无象”的状况，把軍閥

比作肇禍的豺狼。作者除了敘述了親友的訣別，概括了“白骨蔽平原”的戰亂慘象，特別突出地以逃亡中飢婦棄嬰的情景，寫他對戰亂中罹難者的深切同情，對軍閥罪惡的無情揭露，以及哀悼故國的激情。

這首詩刻劃了逃亡的飢婦和作者自己的形象。兩者之間有區別又互相聯系。一個是逃亡棄嬰的飢婦，一個是拋親別友的詩人，彼此是不一樣的。但在軍閥混戰中的受難者卻又基本上相類似。作者悲嘆飢婦，也正是感傷自己，痛恨軍閥，也由於眷念祖國。作品以寫實結合抒情，恰好能夠把社會動亂所引起的苦難生活與複雜心情作了集中地具體地描繪。

“南登岷陵峯，回首望長安”，是作者的抒情警句。兩句抓住了外在代表性事物生動地表現了作者的內心世界。句子本身的响亮音節也加強了藝術表現力。齊梁聲病論倡導者，曾把這兩句詩當作永明體的典範詩句。這和詩句的諧和韻律有關，也同他所表現的思想內容有關。

《七哀》詩的第三首，寫了人民出塞戍邊的痛苦生活。邊城是“冰雪截肌膚，風飄無止期”，人民到那里戍邊戰鬥，出塞時是“行者不顧反，出門與家辭”，到了邊廷就是“子弟多俘虜，哭泣無已時”。作者同情這些戍邊戰士，同時也用“蓼蟲不知辛，去來勿與語”的結語，對不顧惜人民、不關心戍邊的封建統治者表示不滿。

寫邊塞人民生活鬥爭的佳作是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行》以修筑長城為題材表達了勞動人民對殘酷的封建徭役的不滿與反抗心情。在封建社會，修筑長城是沉重的徭役之一。作品首先把人民遭受奴役的憤慨，也就是官民之間的尖銳衝突與人民的反抗性作了具體生動的描寫。接着，作品把勞動人民家庭破敗的悲慘景象，夫妻間的互相惦念與互相安排，也就是封建徭役對人民生活的破壞及人民的痛苦心

理，作了进一步的敘述。而在上述的描述中，如通过官民的口角以表现人民反抗精神，通过往返书訊以表现人民痛苦心理和道德品质，則尤其是深刻的、动人的。所有这些，表现了阶级社会的现实，也显示出作者恨仇封建統治、同情人民痛苦的鮮明傾向。全篇詩是一篇对封建迫害的控訴书，具有很大的现实性与人民性。

这首诗继承了民間詩歌的优秀傳統。表现在詩的起兴、對話及民歌語句的运用，尤其表现在民歌思想傳統的继承。其次，詩有具体的描写，有概括的敘述。笔法是多种多样的。句法长短不齐，錯落有致，跟着詩的思想內容的發展而具有相应的变化。同时，在一般的敘述中常插入精辟的警句；所有这些都加强了思想內容的艺术表达。

阮瑀的《駕出郭北門行》描写后母的虐待孤儿。孤儿的遭遇是悲慘的：“飢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枝”。作者以这样的描写表达他的关心社会問題、同情弱者的精神。

汉乐府中有許多是歌唱孤儿生活的。如《孤儿行》、《妇病行》等。又如汉乐府中的《上留田行》：

里中有啼儿，似类亲交（原作父誤）子。同車見啼儿，慷慨不能止。

可以看到是阮瑀都接受了民歌傳統的。这也是建安七子写作的重大艺术特征。

蔡琰的《悲憤》詩也是产生在这时期。

蔡琰，汉末作者蔡邕的女儿，字文姬。初嫁于河东卫仲道，夫死无子，归宁在蔡家。初平三年（192）正月，董卓将李傕、郭汜，大掠陳留、潁川等地方，她被胡羌軍虜去。兴平二年（195），十一月，匈奴左賢王去卑与楊奉、董承等合战败了李、郭等，她遂沒入南匈奴。文姬在胡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用金璧把她从胡中贖回，第二次嫁給陳留人董嗣。文姬是